

駒場教養學部的傳奇

李弘祺

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學系講座教授

在東京目黑區“東大前”火車站旁邊，有一個東京大學的校區，名叫駒場，這個校區比坐落在文京區、以赤門而名聞於世的東大校本部略小，但是比較接近東京的鬧區。它是東京大學一年級新生讀書的地方。叫作教養學部（直到1983年，東大官方所用的正式的英文名稱是 College of General Education，那一年教養學部改名為文理學院，英文名也改稱為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現在則逕稱為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Junior Division，仍在此校區上課，也仍稱為教養學部）。凡是進東大的新生都在這裡修讀基礎或核心課程（教養課程），大概一年半之後，才陸續到他們要選讀的主修科系，先後轉到“赤門”去攻讀專業課程。

教養學部就像是美國的自由學藝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s)一樣，提供的是博雅課程，讓學生在知識的廣度和人格的陶養方面都得到嚴謹的基礎訓練，使他們能成為社會上有用的領導者，扮演一個受過教育的知識人的角色。

這樣的一個學部在戰前的日本是沒有的。戰前的日本教育師法英國和德國，並不重視通識教育。戰後，在聯軍的佔領之下，帶有濃厚自由主義色彩的麥克阿瑟主導教育政策和措施，推動種種改革，其中最為重要的莫過於是1949年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的成立。

去年我因為擔任東京大學一個研究中日海上文化交流計劃的國際顧問，到駒場參加諮詢會議，在那裏盤桓了幾天，從外表看來，這個校區和東大本身沒有太大的分別。但是當我聽說規劃設立這個教養學部的東大教授是矢內原忠雄時，我的心情不免就興奮起來。因為矢內原忠雄是近代日本史上有名的“人格者”，我所知道有關他的事跡本來就很多，只是萬萬沒有想到他竟然也是東大教養學部的創設人。

矢內原忠雄就是有名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的著者。說到它，那當然是臺灣近代知識人所人人熟知的一本書。敬仰他反對殖民主義的人很多，不用我在這裡細述。這裡只需提到一件事，就可以讓人們了解他的研究不僅很受當時日本政府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人的歡迎，而且是開啓殖民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先鋒。1984年由史丹福大學出版的《日本的殖民帝國，1895-1945》（由 Ramon H. Myers

與 Mark R. Peattie 合編)就把這本書獻給他。這就代表了她的客觀研究的成果，以及對正義的堅持。她的道德信念適當地表現在精深的學術研究上面，而開拓了一整個新的學術方法和研究領域。事實上，他對朝鮮人的同情更有勝於他對臺灣人的同情，因此在朝鮮，也有非常多的知識人對他敬仰有加。

到東京大學校本部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去參訪，你會發現它的第一任所長就是矢內原忠雄；到經濟學系，你會發現它藏有當年亞當斯密寫那本有名的《國富論》時所參考的全部的圖書，因為它們現在收藏在這一系的圖書館裏。矢內原忠雄在 1921 年到英國訪問時，發現了這一批書還存著，並且將要公開出售，因此他就把它們買了，帶回東京大學。那時他剛到東大教書，卻有這樣的勇氣和識見。現在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些書上亞當斯密的眉批，這些都得感謝矢內原忠雄。他還親自編撰了這 608 本書的目錄。這本目錄經常再版，現在還可以在 Amazon.com 買到。

然而，他還有更為令人感動的事跡：就像他寫了《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書一樣，在民國 26 年，當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全力從滿洲向華北“進出”時，他竟然本著一個基督徒的良心（關於他的基督教信仰，容我以後再寫）出來反對日本侵華。他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國家の理想》，發表在那一年九月號的《中央公論》上，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行為。為了這麼一篇文章，日本軍部強加壓力，要東京大學把他解職。這樣的遭遇不免使我想起六十年代的殷海光先生。知識人的遭遇何其令人感嘆，而殷先生最後鬱鬱以終，不像矢內原先生能看到戰爭結束，這就令人對殷先生更為同情了。

然而，矢內原的經歷其實也不遑多讓，不能不令人一般的感概。

離開了東京大學之後，他經濟拮据，生活遭遇困難。我最近翻讀去年剛剛出版的 1938 年林獻堂的日記，發現他在窮困之餘，甚至於透過蔡培火先生來向林先生商求經濟援助（林先生當時正好在日本）。宗主國的知識人居然需要向被殖民地政府欺壓的臺灣人求援，這是多麼吊詭呀。林先生當然慨然答應。不過幾個月後，矢內原又託蔡先生再來致謝忱，卻表示說已經不需要林先生的支援了。我敢說林獻堂並不知道為什麼矢內原改變了初衷。但是我相信這是因為有另一件非常感人的事發生了。這就是當時日本最大的書店，岩波書店，的老闆拿了等於矢內原先生兩年的薪水給他，請他寫一本他所最欽佩的歷史人物，這就暫時解決了他的困境。所以他就不用麻煩林獻堂先生了。矢內原的這本書寫進了孔子，佛陀，蘇格拉底，耶利米、耶穌、日蓮等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事態如此危急之際，岩波的老闆居然有這樣的勇氣出來支助矢內原先生，這是一則多麼感人的故事！

怪不得在今天，對猶太人所遭遇的浩劫 (holocaust)，中國與朝鮮（以及臺灣）的慰安婦醜聞，日本在中國東北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南京的大屠殺等罪孽反省最

為深刻的山田正行（大阪教育大學教授）會把日本的反戰理念、和平主義以及反對發動對華戰爭的思想源頭追回到矢內原和新渡戶稻造。是的，新渡戶稻造就是矢內原的也詩，而他的全集就是矢內原所編撰。這些日本的先知們就這樣，在非常艱難的時刻發揮他們作為知識人的良心，勇敢地面對軍閥的無知和暴虐，忠實地扮演了近代世界進步思想的表帥角色。

1994年，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連同孫文的《三民主義》以及余英時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等書被東京大學選為二十世紀影響東亞研究的最重要的十七本書。

在駒場的校園裏，今天立的有紀念矢內原石碑。偉大的學校曾經培養了偉大的人物，而這位偉大的人物又將長遠地留在曾經在駒場受過通識教育的學子心中。再過幾天，我又要到東京大學參與他們計劃的諮詢。我將有機會再一次到矢內原的石碑前，去瞻仰這一位先知型的偉大教育家。他所象徵的正就是通識教育的永恆價值。

（或許有人讀了這樣的文章，會覺得這是一種造神運動的寫法，不過我還是認為世界上就是有些人會為一些應該堅持的理想來生活的。至少，像矢內原先生這樣的人在教育上所造成的重大影響和敢於站出來反對日本侵華，指摘日本殖民政策的錯誤措施，這些都還是令人佩服的。弘祺又及。）